

同治西北战争的一个侧面： 战争波及人群的心理创伤及长远影响

路 伟 东

(复旦大学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上海 200433)

摘 要: 同治西北战争研究表明: 战时西北小民普遍遭受了比较严重的心理创伤, 战后的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遗忘是小民在内心受到创伤之后的一种自我保护。个体的心理创伤最终会演化成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结构, 并固化在经济、文化以及风俗等之中, 在今后长期的个体和群体社会行为方式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并对下一代甚至更多代的人们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同治; 西北战争; 创伤后应激障碍; 选择性记忆; 选择性遗忘

中图分类号: K254.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627(2018)02-0021-07

个体亲身遭遇、亲眼目睹或亲耳听到身边熟人述说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死亡, 或受到死亡的威胁, 或躯体完整性受到严重创伤后, 往往导致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某种程度的精神障碍。现代心理学把这种心理问题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①)。对于同治年间这样一场导致整个西北地区发生沧桑巨变的惨烈战争来讲, 凡战火波及之处, 整个社会都暴露于这种严重的创伤事件之中, 死亡与死亡的威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几乎无人可以独善其身, 超然于事外。面对惊慌失措的逃生经历、纷繁芜杂的屠戮焚掠信息、肆意横行的瘟疫和粮食饮水短缺以及对个人和家人未来生命安全不确定性的担忧等, 民众时刻处于超负荷的精神高度紧张戒备状态中, 极易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

相对于躯体的损伤, 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影响更加深远。一战以来的心理学研究表明, 许多曾经卷入战争混乱状态的人, 在战后数月甚至数年之内, 都会经历破坏性的心理困扰^{[1](181)}。但在传统范式的人口史研究中, 战争往往只是人口变动的一个背景。透过宏大的、结构性的叙事方式, 研究者关注的大多是战争导致的人口变动以及与人口变动有关的特点和规律的探讨与总结。那些作为战争参与者和受害者的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个体则很少能够看到, 至于战争造成的心理层面的创伤及其影响更是鲜有关注。

本文以同治西北战争这一近代西北人口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例, 对战争引发的心理创伤层面的部分问题, 包括有关战争的残酷记忆、幸存者的心理创伤、群体性记忆的形塑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更长远的影响进行探讨。希望这一工作可以增加人口史叙事的维度, 丰富人口史研究的内涵,

收稿日期: 2017-12-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地方行政制度演变与区域社会的发展”(16JJD770012);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17 年度出版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路伟东(1974-), 男, 山东肥城人,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人口史研究。

① PTSD 是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的简称, 是指由异常威胁性或灾难性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

从而更加立体而全面地展现西北历史人口的全貌。文章不足之处,希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历史文献中关于同治西北战争的残酷记忆

同治西北战争源于回、汉琐碎细故,回民与官军之外,半官方的地方团练亦参与其间,彼此利害纠葛,关系错综复杂,屠戮焚掠极其惨烈。战事所及之处田庐多被焚弃,沃野尽为焦土,几乎无人可以置身事外。对于升斗小民来讲,战时唯一的选择就是逃命。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和社会关系网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无力远徙避祸,只能就近躲藏求生。然事前既无筹谋,遇事亦无良策。兵从东来则西行,兵从北来则南突;兵从陆地来则下水,兵从平原来则上山。总之,如何逃,往哪逃,逃多久?没任何的计划性和前瞻性。除了麇集于治城堡寨外,更多则是临时就近栖身于村中窑窖、窑洞、楼塔、庙宇之中或村外塬峁沟壑之间^[5]。

面对残酷的战争,普通小民从众心理相当突出,多数人深信人口集聚的堡寨比一般乡村聚落更安全。地方精英群体也认为,筑堡练团既可保家安命,也能效力朝廷。基于这样的普遍共识,大量人口趋之若鹜麇集于堡寨之中。然而,堡寨所处多为战略要冲,利害攸关,参战各方往往反复争夺。同时,人聚之处亦是财聚之处,为抢夺粮饷兵马等战略资源,各方攻伐极其惨烈。更危险的是,堡寨作为团练依托,把枢纽型治所城市与散点型的乡村聚落串联起来,成为官方防卫体系中的一环。所有躲避其间只求自保的小民,在地方团练的怂恿裹挟、君臣正统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洗脑与误导下,往往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战争的泥潭,最终死于非命,沦为战争的牺牲品。

战火波及之处普遍发生饥馑与瘟疫,往往造成更严重的人口损失。三原县同治三年(1864年)统计损失人口9万人,其中战时直接死亡者2.3万,病故者高达4.8万,失踪者1.9万,合计超过战前人口的半数以上^①。战后北门外建六个大冢用以埋葬附近尸体^{[6](231)}。战时青壮劳力锐减,会导致土地抛荒,贻误农时无法正常下种收获,同时正常的粮食流通亦被打断,极易造成严重的饥荒。比如,同治元年(1862年)临潼被围后,城中乏食,“难民徒手入城者,数日相继饿死”^{[6](156)}。同治三年夏,省城兰州饥荒,“饥民割死人肉食之,继乃杀人而食。携持男女赴河者,官至不能禁。城中生灵存者十不能一二”^{[6](126)}。就连号称陇东粮仓的董志原在同治六、七年间也发生严重饥荒,斗麦“十二串亦无可买之处,饿殍载道,人兽相食”^②。隆德县同治十年“大歉,斗米二十五六千文不等,人相食,死者塞路”。同治战后平复时,全县尚无二三十家^③。

战时瘟疫普遍发生,仅甘肃一省,战争期间,就至少有18个州县发生过较为严重的瘟疫^{[6](1517~1518)}。瘟疫流行与饥馑和紧张、惊恐等心理应激反应导致的机体免疫力下降有关,也与大量尸体无法及时妥善处置以及饮用水污染等原因有关。战时小民,尤其是老弱妇孺自我了断的主要方式除了仰药、自缢、跳崖外,就是投井。官私史料中此类小民跳井的记载极多,不可胜数,如临潼姚家堡被围七昼夜不克,民如惊弓之鸟,闻县城被攻破,即跳崖投井死者有千余人^④。西安围城期间,洗回消息日夕数警,城内回妇皆持剪蹲守井口随时准备自尽^{[6](178)}。同治元年六月初,胜保统兵入陕,省城西安附近“井中皆有积尸,求水亦不可得”^{[6](255)}。此时战事方起不久,大量井泉已因小民投井而遭到污染。军队水源即已如此匮乏,小民饮水窘迫之形更毋庸言表。对尸体进行有效处理可以极大减少瘟疫发生概率。从战后方志中大量旌表出资殓尸善行的记录来看,战争期间,有太多的尸体无法得到及时掩埋。礼泉围城期间,“生擒者俱戮于城门北墙下。时方炎暑,臭气袭人,于是疫病大作,日有死亡”^{[6](310)}。同治六年(1867年),崇信县“瘟疫流行,城乡传染殆遍,棺木

① 光绪《三原县新志》卷三《田赋·户口》。

② 民国《重修灵台县志》卷三《武备》。

③ 民国《重修隆德县志》卷四《拾遗》。

④ 光绪《临潼县续志》卷上《殉难士民》。

俱穷,多以芦席卷埋”^①。骸骨暴于野极易遭狼犬啃食,西北冬日苦寒,黄沙白雪,尚无大碍。但夏日酷暑,暑气熏蒸,尸体极易腐烂,对生者的影响就极为显著。

战争持续十余年,西北人口损失总数以千万计。同治西北战争是中国近代人口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是回族人口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不但彻底改变了西北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损失,也对幸存者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影响深远,难以估量。

二、战争幸存者的心理创伤及长远影响

一份对当代21 198名中国军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PTSD 患病率平均为4.85%。其中陆、海、空军和学员的 PTSD 患病率分为4.84%、5.80%、8.40%和2.27%。对特殊兵种或在执行抗灾任务后的军队来说,PTSD 发病率显著高于平时时期^②。显然,PTSD 的发病率和军种危险程度存在正相关。现代医学和心理学把 PTSD 视为一种需要进行必要人工干预的精神疾病,而非可以自愈的反应性精神障碍。但传统中国社会中特别强调国家、集体和家族利益,漠视和忽略个体诉求,尤其缺乏对个体心理层面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个体亦往往把精神痛苦视为肉体痛苦的副产品,倾向于将精神痛苦内敛和隐藏,而不是表达和宣泄出来^③。因此,传统文献中缺乏对个体心理创伤的相关记载。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历史时期战争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其真正内涵就与现代心理学和医学所称的 PTSD 有所不同,只能定义为一种比较宽泛的长久存在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创伤。

同治战后,各地新修方志及各类碑刻中记载了大量战争遇难者的个人信息。比如,光绪《三续华州志》就用5卷共492页的篇幅,分宦绩、武功、孝友、处士、义行、烈士、烈女、烈妇等门类,记载大量的各类人物。这其中,篇幅最多的是登记所有战争遇难者姓名^④。清人宋佑文战后著有《旷典阐幽录》,书中详细记载了大荔县战时死亡人口名单。马长寿等人当年在大荔县调查时也发现,县城清真寺大殿墙壁上三面嵌有石碑,碑上刻举各村男女死亡者姓名12 000多人^{⑤[91]}。志书碑刻中这种数量极其庞大的死亡名单,对于后世读者来讲,可能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人,也不了解任何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但是,每一个姓名背后所代表的都是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其分量可想而知。看似简单的名单,其实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信手翻来让人印象相当深刻。

修志、立祠以及刻碑等都是地方上的重大事件,一般都由官府主导,参与者大都是地方上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士绅代表,体现的是地方精英阶层的集体意志。可以在其中留名者,一般非富即贵,正常情况下,普通小民很难跻身其间。同治战后,西北方志和碑刻中,用大量篇幅记载那些战争遇难的普通小民姓名,首先要表达的大概不是对每一个遇难者个体的尊重与纪念,而是“清廷”这一作为战争最终的胜利者,对“敌对”一方的鞭挞和痛斥。同治战后数十年,在关中乡间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殉节牌坊与石碑,也反映了这场战争对地方造成的严重冲击和深刻影响。

除了对于战争的群体性记忆,个体的经历更为鲜活,也更为具体。旧时渭南民间常用“回回来了”之语来哄骗小娃,以使其停止哭闹。这与内地他省制止孩子哭闹的常用语“狼来了”相似。渭南耆老朱力斋称“我在少时常做回乱的梦,梦到在逃回乱。我所以有这种梦,并非我逃过回乱,是因为年老逃过回乱的人,经常给我谈起在回乱中逃命的事。不只我如此,年老的人做此梦者甚多。”^{⑥[49]}梦到曾经可怕的创伤经历,是 PTSD 中典型的再度经历症状,虽然不喜欢但仍会不自觉地想起,甚至变成噩梦。或者像做白日梦一样再度经历,倒叙重现。这些战后出生的人,仅仅是听当年经过战争的老人讲述就会产生这种再度经历症状,的确罕见。由此可以想象那些战争亲历者,在给子孙后代讲述自己当年亲身经历的战争恐怖场景时,那种发自肺腑的声情并茂的真情流露。对于他们来讲,战争造成的 PTSD 恐怕会伴随终生,而无数次从噩梦中惊醒时的恐惧与折磨,也只

① 民国《重修崇信县志》卷四《志余》。

② 光绪《三续华州志》卷八《人物志中》;卷一〇《人物志下二》。

有他们自己能够切身体会。这种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几代人心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深远。

除了个体心理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些地方风俗也被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比如,大荔县八女井和王阁村一带,有正月十五妇女回娘家的风俗。最初起因,据说是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十五,逃往甘肃的回民又打杀回来一次,当时汉人正忙着过元宵节,听说回回来了,大为恐惧,于是大家又纷纷逃散一次。此后,成为习俗,一直持续到现在^[1](120)]。盩厔县临川寺一带每年冬至日有集市,最初起因也和当年的战争有关。临川寺是盩厔东乡巨堡,距县城约50里,当年有汉民1500余户,其中仅教师爷和会打拳的就有五六百人。又联合附近各村组织两大团练,轮流在县东境把守,堡坚人众,傲睨自若。同治二年正月,东府大批回军西撤,此堡为必经之路。回民深知此处教师爷众多,而村民亦知东府打斗之惨,故彼此皆不愿生事。回军自堡南平稳西行,初村中恶少以猪头讥之,经耆老调停息争。大军过毕之际,堡内复以炮击之。双方遂发生打斗,最后临川寺被踏平,本村及外村避难小民多被屠戮。事后每逢冬至日,村里各家和村外的被难家属共设案焚香蜡,悬死者的姓名单于壁间,叩头祭祀。四城之外都有义地,埋葬当年死者的尸骸。近几十年来冬至的祭祀日慢慢变成了集市。附近十几县的农民、商民都来此上集,买卖各种货物^[1](323)]。

除了战争的杀戮,战时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原因还有很多。这其中,瘟疫与饥饿的影响就非常大。因为这两者持续的时间更长,造成的人口损失更多,对身体和精神造成的实际伤害也更大。对于普通小民来讲,战时的杀戮与攻伐虽然最终逃无可逃,但至少可以有所应对。而瘟疫则使人逃无可逃,大部分情况下只能被动承受,容易使人产生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心态,这种情绪低落也是PTSD的典型症状之一。官私文献中有关于战时严重缺粮,大量人口饥饿而死,甚至人相食的案例。战争期间,这样的事件频繁发生,相关案例举不胜举。饥饿致死的过程相当煎熬与漫长,极易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而人兽相食,甚至人相食的惨剧,则是心理的完全变态。在食人者眼中,人只是行走的肉体,是充饥的食品。在被食者的眼中,食人者已完全变成人形野兽,没有任何人性可言。这种完全丧失最基本人性的行为,除了满足暂时的果腹之需,其实对食人者本身造成的心理创伤更大,而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更是极其深远^[1](368)]。很难想象,有过此种经历的幸存者,在战争结束之后,内心会承受怎样的恐惧感与负罪感。对于这些经过战火蹂躏的人们来讲,种种积淀于内心深处的负面情绪和心灵创伤,会不会演化成一种群体性的心理结构,在今后长期的行为方式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并对下一代甚至更多代的人们,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三、选择性遗忘与战后回民的群体性记忆

西北地区是回回先民最早的落居地,同治战前,西北回族人口数量有七八百万之巨,在全国回族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超过70%。其中陕西号称中国回回教门之根,自唐宋以来即为回回聚居之地。仅关中三府二州繁华之区,其人口就有一百三四十万之众。在部分州县之中,其人口所占比例高达三四成。同治战后,陕西一百数十万回众,仅余西安城中数万,几乎根株尽绝。甘肃回族人口则从战前的六百万锐减至战后的百余万,人口损失绝对数量更是惊人。历经同治沧桑巨变后,当祖辈故土都变成遥远的再也无法返回的过去时,回民对当年战争是如何记忆的,这种记忆与汉民的记忆有何不同之处?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思量。

战争的残酷性在于,战火波及之处无人可以置身事外。八里桥是距同州府城七八里的一个小村子,“原有二十余户人家,三分之一是回民。起义前两族人民彼此相安,有认干亲的,有拜把兄弟的;起义之后,两族父老相约,既不内讧,亦不干预外事。以后先来了汉民军队,声言纠察回、汉有无滋事,拉走了几人;回军来了,又拉走了回民若干;汉团又来,拉走了汉人若干。至此,外面军队来,妇女皆死”^[1](192)]。八里桥村民最后的悲惨结局是,回、汉普通小民在同治年间巨大的人祸面前,万般无助,无可奈何之间,逐步被动卷入战争之中,最终沦为战争的牺牲品。

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据临潼县耆老刘霭如讲“临潼的回民起义在同治元年

(1862年)约阴历五月初的时候,当时春麦刚收完,正在种扁豆。我父亲在一天早晨正要赶到地里种扁豆,这时天还未亮,看见从八里绅那边过来二百多个马队,见到路上行人便杀。我父亲刚出村郭,没有碰上。马队过后,父亲在路上遇到八里绅回民叫银城子者骑着马跑来,银和父亲本相熟识,于是喊了一声,银城子回头对父亲说“不要喊,一喊连我也得死,快往山上跑,要杀人了。我们到油房街去!”^[1](137)]刘霭如讲述他自己父亲的亲身经历,应该比较可信。战争迫近之际,小民没有任何预防,仍然早起前往地里种豆子。而从银城子对话中惊慌失措的表现,可以切身体会到大难来临之前,普通小民,不论回、汉,均被战争裹挟而无力反抗的惶恐处境。

当民间个体的冲突与矛盾,演化成回、汉两个族之间的敌视与对立,最终以惨烈战争的形式爆发出来时,对于那些迷茫之中被裹挟的普通回民来讲,在被迫舍弃所有财富与社会关系,踏上连性命都无法自保的西迁行程时,心中的无奈与凄惶只有他们自己最能体会,据说当年邠州井村的回民西迁时,曾引起各家回民大哭^[1](233)]。沙苑三十六村的回民当年西迁之时,据说其中“有些回民和汉民无仇怨而相善者,皆不愿迁。到非迁不可时,与汉族邻友相遇于道,便对汉人说‘亲家,不对啦!要分离啦!’”^[1](105,106)]南王阁的回民起手后,“回回老人们对我村的汉人说‘亲家,我村人反了!’言下有顾念旧交之意”^[1](127)]。两段行文中的回民经历虽皆未有井村回民悲惨,但估计文字背后隐含的真实的情形,可能也不会相差太多。

民族学家马长寿等人当年调查时,祖籍同州东丁家村的85岁耆老伍明义自称,十几年前曾到陕西西安和大荔探望,他很感慨地说“我们在那里有邻家,有朋友,也还有亲戚。相见之下,问长道短,好不亲热”^[1](423)]。这样的讲述和内容相当鲜活生动,不但声情并茂,而且言之凿凿,相信落居西北战后劫余的回民读来会感动得热泪盈眶。然而,实际上,这类的事件的真实性颇值得思量。战后陕西,尤其是回族人口原来最为密集的关中一带,除西安城内外,回民已经绝迹。光绪初年,官府传西安城内6家回民出外为他们贩马,回民才算出了城。“据说在东关亢家堡子有些妇女、小孩争着看回回,称说和他们一样,无甚异处,为何那样可怕?”^[1](201)]妇孺以看到传说中的回民为稀奇之事,可见西安回民被禁锢城内的18年间,城外四乡已无回民踪迹。战前关中回人密集,回、汉同村共井的地理分布格局至此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战后各地汉人对回民相当忌惮,三原县战后禁止回民入境,把城中战前回民聚居的兴和巷改为太平巷。一直到民国初年,才渐有回民小贩前来三原城内以经营牛羊肉为生^[1](232,236)]。同治战后西北人口锐减,很多聚落焚掠之后成为废墟,仍有居住者,居民很多也已尽是外来移民,与原来聚落之间,除了仅有的相同的村名之外,实际已没有任何关系。马长寿等人当年调查时,原北王阁小学的校长樊涛就称“凡从前回回所在的村落,现在多是外省人,对于同治年间的事多不清楚,反而不如询问回村邻村的汉人子孙所知为多。”^[1](129)]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至民国末年,流落甘肃的关中回民回到原来的老家,恐怕早已是物非人非。伍明义讲述的亲身经历,即使是真的,那估计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个案而已。很多情况下,类似描述背后反映的真实情感是劫后余生的关中回民,对祖辈所居繁华故土的无奈想象,而在最真实的内心深处,那些地理空间距离上不太遥远的故乡,实际上已经变成相当陌生,再也回不去了。

除了散居甘肃、新疆等地,陕西回民中还有一小部分在白彦虎的带领下,于光绪三年(1877年)冬天,撤退至俄国境内,当年被迫西迁的上百万陕西回民至此所剩不过万余口。这万余人就是现代中亚东干人的最初源头。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东干人在物理上完全隔断了与故乡的一切联系,成为清代关中回民的活化石。这批人生活状态中的诸多片段,仍然停留在同治年间。对这些人集体记忆的解读,是了解同治年间关中地区回族人口真实场景的钥匙。

最初移居中亚的东干人皆是百战之余,历尽千难万险始得死里逃生。而在近乎赤贫状态下,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其所经历的艰难与困苦,后世局外之人很难真正体会。对这批人来讲,战争造成的创伤和惊恐过于强烈,而最终付出的代价尤难承受。王国杰在东干人中调查时会记录到“第一

代东干人里有哭瞎了双眼的,有冻坏了双脚的,还有气疯了的……第一、二代东干人心灰了,不愿也不可能回陕西看看。”^{[10](376)}这是最早一批东干人对自己曾经真实生活过但同时又遭受过巨大打击的遥远故土的最真实感受。但曾经生活的记忆很难被彻底抹去,尤其是祖宗坟茔所在,根本无法完全割舍。白彦虎临终时就留下口话“以后等满清完了,你们一定要回去。我们老爷的肚带子在那边呢!”^{[10](375)}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物理上的彻底隔绝,当所有痛苦的记忆被刻意选择性地遗忘之后,东干人对远方曾经真实存在的祖辈故土的想象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东干人把陕西叫作“我爷的省”,因为那里是祖辈千百年来曾经一直生活的家园,这一称谓应该是迁居中亚之后才有的。东干人把汉人叫作“老舅”,因为回族人的母系祖先是汉地的妇女,老舅是母亲的兄弟,是最至亲的人。这一称呼大概是同治以前关中回民对周边汉人比较亲切的一种习惯说法。东干人中流传的谚语称“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宁恋本乡一捻土,不爱他乡万两银”“乡党遇乡党,两眼泪汪汪”^{[10](382)}。新渠乡庄大吴·索阿訇诺夫称,“百年来我们就像失群的羊,不知何日才能回到大羊群里去”。该乡庄还有个叫马兹涅夫的东干人,曾于1959年在莫斯科买到一幅《老鹰抓小鸡》的中国年画,保存了30多年^{[10](375~376)}。萨里尔是东干诗人什娃子的第三个儿子,父亲去世后留下了一栋小楼和大笔的稿费,萨里尔的生活条件相当好,但他自认为生活的并不幸福,他说“我一生最不理想的事是我没去过中国,我一生最大的不幸是不识汉字,只能讲陕甘方言。我最痛苦的事是我这辈子是用别人的语言来思维。”^{[10](344)}萨里尔的话比较传神地刻画了当代东干人对内心想象中的那个遥远故乡的思念。在流落甘肃的陕西回民之中也有相似的表述。当年马长寿等人调查时,渭南新城村的汉人李元兴就称“走后的回回对汉民仍然是很好的。光绪年间仓头有人到平凉、泾川,遇到回民,回民说‘邻家来了。’三四天吃饭都不要钱。”^{[3](57)}汉人民间这种口口相传的对回民比较正面的记忆,可靠性应该还是比较高的。从所有这些回民自己或他者有关回民的讲述中,没有任何当年战争的影子,似乎所有与战争有关的痛苦记忆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对祖辈故土的无尽想象。

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记忆一样,都是PTSD的重要特征。回避与创伤性事件有关的活动,对创伤性经历的选择性遗忘或记忆,是内心在受到创伤之后的自我保护。祖籍泾阳塔底下的杨生福老人讲“这些故事,近年来不谈了。从前,老辈人们经常谈,而且到伤心处,无不痛哭流泪!”^{[3](406)}在战后回民最主要的安置区甘肃泾源(即清之化平厅,今属宁夏)一带,回民中流传着“秦家是惹事的根子”“祸从秦家起”的说法。当这些经过战争百般蹂躏之后的劫后余生者,失去所有,被安置在远离故土的西北荒地时,他们把心中对战争的不满或多或少地转移到同样是战争受害者的“秦家滩”人头上,背后真实反映的,其实多少有一点因战争而内心受到极度创伤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候群。实际上,作为西北战争的起点,在团练火烧秦家滩事件中,秦家滩人并不是该事件的主动发起者,而是被动受害者。但自此而始的西北战争,对陕西回民族造成了太大的冲击,自唐宋以来,历经千百年积累,包括人口在内的几乎所有一切都损失殆尽。这种几乎是完全根株尽绝的战争后果,是任何回民都无力承担的,也是很难接受的。

1990年,王国杰前往中亚东干人聚居的营盘乡庄进行实地调查,几个东干小伙子抬着他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并喊“老舅家来人了!”这一场景让他十分感动,终生难忘^{[10](377)}。实际上,当这样一个生活在东干人祖辈的土地上,操着与东干人近乎一样陕西土话的汉人,在完全隔绝百余年后,突然出现时,他对东干人情感上的冲击,要远比他感受到的来自于东干人的难忘和感动强烈得多。由此,完全可以想象,当年西迁陕西回民的后人,在百余年后的1991年10月3日,终于踏上那片曾经无数次想象的祖辈故土,根据白彦虎的口话拍打西安城门,完成他的遗愿时^{[11](399)},是一种怎样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

四、余 论

战争作为人类非理性的群体行为,其残酷程度,远非久处和平年代从未经历过战争蹂躏的人们

可以想象。大规模战争是历史上中国人口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历经数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慢慢累积起来的人口,往往因为一场战争,在数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损失殆尽。通过对同治西北战争的分析可以看到,战争作为人类非理性的群体行为,其造成的损失往往超出当事人最初的想象和承受能力。相对于直接的人口死亡、财产损失等表象,战争对受波及人群造成的心理层面的创伤虽不引人关注,却同样触目惊心。同治西北战争期间,凡战火波及之处,整个社会都暴露于严重的心理创伤事件之中。民众面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死亡与死亡威胁,精神高度紧张,时刻处于超负荷的戒备状态之中,群体性的严重的心理创伤由此产生。

同治西北战争后,民众往往主动回避或过度夸张与当年战争有关的信息,这种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遗忘一样,其实是事件当事者内心在受到创伤之后的一种自我保护。对于那些经过战火蹂躏的人们来讲,种种积淀于内心深处的负面情绪和心灵创伤,最终会演化成一种群体性的心理结构,并固化在经济、文化以及风俗等之中,在今后长期的个体和社会行为方式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并对下一代,甚至更多代的人们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人为选择记忆的口述历史成为后世读史者认为的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时,需要重新审视、认真辨析并努力还原这些被严重心理创伤和不同历史语境中扭曲的记忆和文本。尤其在历史照进现实并涉及当下人的切身利益时,重新审视这些文本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极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美] 布彻,米内克,胡利. 异常心理学 [M]. 耿文秀,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2] 路伟东. 布朗运动与在城聚居: 同治西北战时人口迁移的特征与规律 [J]. 江西社会科学,2017(9).
- [3] 马长寿.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 [4] (清) 杨毓秀. 平回志 [M]. 白寿彝. 回民起义: 第3册 [M]. 上海: 神州国光社,1952.
- [5] 袁林. 西北灾荒史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 [6] (清) 易孔昭. 平定关陇纪略 [M]. 白寿彝. 回民起义: 第3册 [M]. 上海: 神州国光社,1952.
- [7] 王焕林,等. 中国军人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 [J]. 中华精神科杂志,1996(2).
- [8] 王玉龙,等. PTSD 在中国的研究进展 [J]. 应用心理学,2005(2).
- [9] 汪汉忠. 灾害、社会与现代化: 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10] 王国杰. 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西北回族移民研究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11] 冯富宽. 寻根记——记宋国公冯胜和他的后代 [A]. 回族学研究文集(下) [C].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木 明】

One Aspect of the Northwest Clash of Tongzhi: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Long-term Influence of the War

LU Wei-d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northwest clash during Tongzhi period, we found that the Northwest people suffered from more serious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 selective memory and selective forgetting after the war were a kind of self protection for the civilians after being injured.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trauma will eventually evolve into a group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being solidified in economy, culture and customs, which stubbornly manifested in the future long way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social behavior, and had a broad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nex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 Tongzhi; Northwest Wa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elective Memory; Selective Amnesia